

【戏曲与小说】

论唐小说集的成书特征

邵颖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唐代小说集的成书主要有记录坊间传闻、传抄改写他作、作者自撰作品三种类型, 与小说情节模式、小说体例、小说题材密切相关。源自坊间传闻或亲友转述的唐小说常在结尾备述故事缘由, 所记讲述者身份、官职对研究唐代文化与历史颇有裨益。书写宗教灵异题材的小说常被传抄改写, 以《报应记》为例可考察唐代佛教经典灵异故事之传播、唐小说流变脉络、传抄所据文献校勘之功等方面。唐代小说集中作者自创作品则充分展示文学想象, 具有持久的文学魅力。

【关键词】唐小说; 成书; 情节模式; 小说题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1)03-0019-04

How to write about Tang novel

SHAO Ying-tao

(Institution of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of tang dynasty have three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recorded an anecdotal, copy others, author writes, they have closely relation with fiction plot and novel style. Novel will introduce the story origin which from anecdotal. Copy other novel often centre on Religious eschews, have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Author display literary imagination, they novels have lasting literature charm.

Key words: tang novel; writing characteristic; Plot model; novels

唐人有意为文, 集卓才、奇情、玄思、妙笔于小说书写之中, 将中国文言小说推至文学巅峰。有关唐代小说的研究成果极其丰赡, 但唐小说集如何编著而成的问题尚未得到详尽解答, 而这一问题关涉故事素材、小说体例、情节模式等诸多方面, 值得深入研究。唐小说单篇佳作大多为作者自创, 极富文学想象, 亦有像《长恨传》之类是在传闻基础上加工而成。唐代小说集的成书情况较为复杂, 主要包含坊间传闻、传抄改写、作者自撰三种类型。

一、素材源自坊间传闻

唐小说集中有相当数量的故事素材来源于坊间传闻或亲友间转述, 系作者在传闻基础上加工而成。此种类型以唐临《冥报记》、郎余令《冥报拾遗》、孟献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等著作为主, 张读《宣室志》、戴孚《广异记》中也有类似情况。唐临《冥报记序》自云“具陈所受及闻见由缘”, 小说集详细交代了每则故事的缘由及讲述者的身份, 如“周武帝”条记:“(唐)临外祖齐公亲见, 时皈(《大正藏》作“归”)家具说云尔。”^[1](p. 50) 郎余令《冥报拾遗》体例袭仿《冥报记》, 亦多记故事缘由, 如“任五娘”结尾云“吴兴沈玄法

说, 净土寺僧智整所说亦同。”^[2](p. 126) 唐临、郎余令的作品, 几乎皆为作者根据传闻撰写而成。孟献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故事亦一一载明来历, 标识讲述者身份, 如“于昶”条自叙“其孙梓州郫县尉于愨亲自说也。”《宣室志》、《广异记》也有源自传闻的现象, 如“今在京师, 闻其事于(董)观云云”^[3](p. 53), “刘成”条云:“备得其事, 传以纪述”讲明成书缘由。此类作品来源于同僚、亲友间的传闻, 其故事讲述者多为士大夫。有些故事虽然并未详述传闻经历, 但从只言片语的记载依然可以推断其源自市井传闻。同一故事素材常发生变数, 如《纪闻》、《广异记》皆有华岳神拘夺民妇魂灵的故事, 应属于同一传闻的不同记载。

坊间传闻是唐小说材料的重要来源之一。唐代小说作者在宴饮集会、酬答唱和、访僧谒缙等过程中收集故事素材, 再在见闻基础上重加整理而撰写成篇。这种成书情况形成固定格式, 故事结尾常有交代缘由的情节, 如《金刚经鸠异·僧法正》、《前定录·柳及》、《灵异记·许至雍》:

荆州僧常靖亲见其事。^[4](p. 270)

平昌孟弘微与及相识, 具录其事。^[5](p. 17)

赵生名何, 苏州人皆传其事。^[6](p. 2260)

【收稿日期】2011-02-16

如实记述故事来源既交代了故事成书过程，还增加了故事的可信度。小说家在交代小说素材缘由的同时，潜藏着史传叙事意识。诚如杨义先生所论“中国叙事作品虽然在后来的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它的形式技巧和叙写谋略，但始终是以历史叙事的形式作为它的骨干。”^{[7] (p. 18)} 唐代小说家是以信史态度创作小说，他们处处模仿史传叙事，为求他人信服，故备述由来以彰显故事真实可靠。

源自传闻的唐小说实际上经过了两次加工：讲述者将个人见闻转述于作者，再经作者整理成文，由讲述者与作者共同完成。讲述者创造故事雏形，为故事提供蓝本，他们借助口头方式将异闻传播于某一范围群体或整个城邑。而小说作者则扮演着再创作的角色，他们对故事素材重新加工，在不改变故事内容的前提下对故事作以润色，或者略微改动某些情节。可借助《冥报记》中一则故事视作者再创作的功绩：

陈公太夫人豆卢氏……欲起诵之，而堂烛已灭。夫人因起，命婢燃烛，须臾婢还，厨中无火。夫人命开门，于人家访取之，又无火，夫人益深叹恨。忽见庭中有燃火烛，上阶来入堂内，直至床前，去地三尺许，而无人执，光明若昼。夫人惊喜，头痛亦愈，即取经诵之。有顷，家人钻燧得火，燃烛入堂中。烛光即灭。便以此夜诵竟之，自此日诵五遍以为常。……夫人至今尚康，年八十年矣。夫人自向临嫂说之云尔。^{[1] (p. 42)}

依据唐临所记，此则故事是唐临嫂子亲耳听闻豆卢氏自述，再由唐临记录成文。唐临所言是否出于实情呢？可据唐人墓志得证。豆卢氏孙女窦琰墓志铭今存于世，《唐故司卫正卿田府君夫人扶风窦氏（琰）墓志铭并序》记载了这一异事：

祖妣豆卢氏，夜中读经，遽而灯灭，有取火者，久而不至。夫人在侍，因徙^①（往）催之。将出户庭，空里有烛影，随夫人所召，直指经处，读之乃毕。列于唐临《冥宝（报）记》焉。^{[8] (p. 329)}

比照唐书与墓志所记，可知此事或有一定的原型，这证实《冥报记》所记故事确实源于传闻。此则墓志为窦琰死后，其亲眷请人撰写，所记窦琰祖母豆卢氏异事可信度较高。借助两处记载可知：唐作文字略作夸张，增饰佛经愈病、延寿情节；而墓志所记则较平实，仅言空中烛影之事。唐临完善了故事情节，增加了豆卢氏诵经得验的灵异，这些地方在墓志中皆未提及。小说家的增衍揭糈文人在传闻基础上屡作改易，此点亦是唐代小说集常见特征。源自传闻的小说如实记录讲述者的身份、履历，有助于研究唐代信仰阶层及见闻者身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像《冥报记》所记高颀子嗣信息便能弥补史料缺失。

二、征引抄录他人著作

抄录前人书籍或对他人的著作加以改写的情况，在唐小说集中较为多见，尤其是宗教灵异题材故事常被不同作者所反复传抄。一些深受宗教思想影响的小说家为劝

化世人皈依宗教，诫谕大众恪守道德约束和宗教戒律，频繁转载个别灵异故事，以致同一故事接二连三出现于不同作品中。孟献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有征引他人著作的素习，援引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冥报拾遗》诸小说集作品。征引唐人小说亦常见于佛教典籍中，如释门类书《法苑珠林》每卷末附有“感应缘”并广引实事为证，征引了大量唐小说，有《冥报记》、《冥报拾遗》、《三宝感通录》、《续高僧传》等。此外，《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法华传记》、《弘赞法华传》、《释氏六帖》、《金刚经报应记》诸书亦引用不少唐小说。这些书籍有的是全部抄录原作，有的仅是对前人故事作以简要概括，略具原故事之梗概。如《释氏六帖》所引“李山龙”、“扬州僧”及“释明舜”等作品叙事甚略，其中的“李山龙”、“扬州僧”两篇虽标引出自《三宝感通录》，实际是《三宝感通录》转引《冥报记》的作品，这些情况反映了唐小说被传抄的惯例与特征。

除孟献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之外，唐代小说集《报应记》亦频繁传抄前人篇什。卢求《报应记》全名为《金刚经报应记》，约成书于大中十一年（857年）前^{[9] (p. 754)}。是书皆记僧俗持念《金刚经》而逢凶化吉之异事，重在宣验佛经灵异。《报应记》之名最晚见于《宋史·艺文志》，可能元人编纂《宋史》时尚见三卷本《报应记》，此后便下落不明。幸赖《太平广记》所征引部分篇章而流传于世，据李剑国先生考证《太平广记》所录现存59条中有54条是可信的，确出于《报应记》。此外，唐代沙门神清《北山录》卷七所载“崔皓妻郭氏”亦应出于卢求之书，可加辑补（北宋僧人慧宝为《北山录》注云“出卢求《金刚经验》也”，文中所指《金刚经验》应为《金刚经报应记》）。《北山录》所记极简，文云“皓妻郭氏诵《般若经》，皓取经，灰之于厕。至是将刑，槛车送城南，卫士十人，行洩其上，呼声嗷嗷，曰‘斯投经之报也。’”^{[10] (p. 619)} 此故事素材出于《北史》，原记较详“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厕中。及浩幽执，被置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洩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为报应之验。”^{[11] (p. 789)}

《报应记》有摘录前人著作的习气，《太平广记》所征引的54则《报应记》作品大多具有文学渊源。《报应记》共转引《金刚般若经集验记》27条，有“赵文若”（《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引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此条与《冥报记》所记内容有异）、“睦彦通”、“慕容文策”（《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引《金刚般若经灵验记》）、“袁志通”（《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引《金刚般若经灵验记》）、“杜之亮”（《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引《冥报拾遗》）、“韦克勤”、“沈嘉会”（《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引《冥报拾遗》）、“白仁哲”（《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作

^① 《全唐文补遗》作“往”，疑是。参见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3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9页。

“向（白）仁愬”、“窦德玄”、“王陀”（《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作“王陀”）、“高纸”（《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引《冥报拾遗》，作高纯“王令望”、“陈惠妻”、“何漂”、“张玄素”、“李丘一”、“于昶”、“裴宣礼”、“吴思玄”、“银山老人”、“崔文简”、“姚待”、“吕文展”、“薛严”、“李廷光”（《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作“李廷光”）、“崔善冲”、“唐晏”。《报应记》“卢景裕”一篇出于北齐魏收《魏书·儒林传》；“董进朝”一则出于段成式《金刚经鸠异记》^①；“崔义起妻”一条见于《三宝感通录》、《法苑珠林》卷八五。加上引自《北史》“崔皓妻郭氏”条，《报应记》抄录前人篇章可考者凡31条，占现存《报应记》篇章数目的一半多。《报应记》所转录的前人作品皆为隋朝至唐开元初期作品，换言之，《报应记》所录开元以前的作品几乎都有源头，并非卢求自创。因为故事从他作缩写而来，故仅存原故事之梗概，远无原故事情节之曲折复杂。

基于抄录他人著作的原因，可通过对校原作与传抄之作的文字以寻求最准确的版本记载。如《报应记》中有不少故事转引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对照两书版本差异有助于分辨讹误，寻求文本的真实记载。像《报应记》“白仁愬”条源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白仁愬”，“愬”古同与“哲”字，故可判断中华书局汪少楹点校《太平广记》所引《报应记》“白仁愬”有误，确当作“白仁哲”^②。复如《报应记》“高纸”一篇，《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引《冥报拾遗》却作“高纯”，究竟孰是孰非？虽然《报应记》“高纸”条抄录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但不能简单断言《报应记》在传抄过程中产生讹误。依《大正藏》编者《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校勘所记“纯一作纸”，可知《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流传过程中有“高纸”、“高纯”两种说法。因为《报应记》保存了《金刚般若经集验记》部分原始文字，据此可判断《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原文作“高纸”而非“高纯”，“高纯”之误恐是后人传抄所致。

传抄他人小说的现象尤为多见于灵异题材，下文便以“高纸”灵异故事传播为例，述其故事渊源与演变历程，借此考察唐代灵异故事被改窜的宗教目的与特征。

《报应记》“高纸”故事源于郎余令《冥报拾遗》“高纯”一篇。郎文此条内容现收于孟献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③卷下，《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原文附有“（郎余令亲自闻说），并注明引自郎余令《冥报拾遗》”。故《冥报拾遗》为《报应记》的最早源头。方铤铭辑校《冥报记》所附《冥报拾遗》未录此篇，《金刚般若经集验记》“高纯”一篇可补方作之阙。此作讲述高颉之孙（高表仁之子）被鬼使拘至冥间，受到阎罗王问责治罪，后因他曾奉持诵《金刚经》而得以重返阳间。综合入冥者身份、故事年代、故事内容、语词字句等多种信息，可以判断《报应记》“高纸”系卢求在郎文基础上缩略而成，原作中的主人公身份、鬼使于普光寺堵截、化度寺僧等情节都被加以省略。卢求还将故事结构略作调整，如将《冥报拾遗》中“舌不损”原因挪移至冥府审问过程中，把“翊卫”职位后移至故事结尾。卢求所作的文笔简化、情

节挪移等工作，使故事简洁明了。但正因为卢求做过文字改易而出现一处纰漏《冥报拾遗》载主人公在入冥前曾任官职，入冥后即出家修行《报应记》因年代久远不知事实，而误将任职一事挪移文后，叙说“后仕为翊卫，专以念经为事。”

“高纸”故事还被唐代诸多典籍所传抄，如道宣《大唐内典录》、道宣《三宝感通录》、道世《法苑珠林》、惠详《弘赞法华传》、僧祥《法华经传记》等。较早记录这一故事的僧侣著作为道宣《大唐内典录》，道宣《三宝感通录》与僧祥《法华经传记》几乎原封不动抄录了前作。《大唐内典录》之后的《法苑珠林》进一步加工故事细节，更趋详细，叙述委婉曲折。从文学角度而言，其文笔超逾前代所述。早前故事只见梗概，《法苑珠林》则对鬼捉、入冥两个情节进行大量补充，使其愈加传神；它对主人公身份有了更明确的交代。此前作品仅简单介绍主人公为高表仁之孙，缺遗名字。《法苑珠林》主人公信息已渐补全，名叫高法眼，还担任公职曾“向中台参选”。但《法苑珠林》所记“高法眼”的姓名及身份似存纰漏“法眼”非系人名，故后来的《弘赞法华传》称为“释法眼”；高法眼非为高颉玄孙，可能是高颉曾孙（高颉第三子高表仁之孙）。道宣、道世同处西明寺，二人所记此篇故事的主要情节又基本相同，很容易让人怀疑成书于总章元年（668年）之《法苑珠林》参考了成书于麟德元年（664年）正月的《大唐内典录》（《法苑珠林》取材道宣之书不乏先例，如“崔义起妻”一条故事即出自道宣《三宝感通录》）。另外，就故事情节、人物姓名判断：成书较晚的《弘赞法华传》可能脱胎于《法苑珠林》。

《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所引《冥报拾遗》“高纯（纸）”故事，并非源于《大唐内典录》诸书。从成书年

① 段成式《金刚经鸠异记》收于《酉阳杂俎》续集，据李剑国先生推断《酉阳杂俎》续集编于大中七年至九年（853—855）间，据此《金刚经鸠异记》成书早于《报应记》。参见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22页。

② 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列举“沈与文野竹斋抄本”、“陈鱣校宋本”、“谈恺刻本”、“许自昌刻本”皆作“白仁愬”，故可确断汪校本《太平广记》有误。参见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6页。

③ 孟献忠系武则天时期人，长安三年时曾任申州司户（作者在“申州大云寺僧释德遵”一条中自云“长安三载，献忠任申州司户”），开元四载（716年）在梓州司马任（作者在发生于开元四年的“唐晏”条记“献忠时任梓州司马”）。据《集验记序》所记是书作于“开元六年（718年）四月”，今存于《已续藏经》第149册。按：日本正仓院所藏唐写本《王子安集》附有孟献忠所著《君没后彭执古、孟献忠与诸弟书》一文，其作者孟献忠系王勃故交。如果此处孟献忠即为后来的梓州司马孟献忠，则孟献忠当生于高宗之世，而曾仕于则天、玄宗朝（此文收于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续编·附录》，1922年上虞罗氏始安堂凝清室本）。又据北宋欧阳棣《集古录目》载唐中宗景龙三年有《唐太子中舍人杨承源碑》，其撰者为孟献忠，以时间推断似为后日梓州司马孟献忠（南宋赵明诚《金石录》载此碑名而署名王献忠撰，赵氏所记或系疏误）。

代来看,《冥报拾遗》比《大唐内典录》还要早。据李剑国先生推断《冥报拾遗》可能成书于龙朔三年(663年)^[9](p.204),要比《大唐内典录》创作时间要早,源于道宣著作的可能性较小。最重要的是,从所记载的内容来看,无论是人物身份、故事年代,还是入冥受审细节上,《冥报拾遗》皆不同与《大唐内典录》、《法苑珠林》所记。故可判断,《冥报拾遗》所记并非来源于佛教书籍,正如文后所注这则故事是“余令赴考入京亲自闻说”。

诸书记载相异的原因在于此故事源于一则京城传说,记录者不同其所记载的内容也便产生了差异。从郎余令“亲自闻说”及《法苑珠林》所言“京城道俗共知”,可知这一故事流传较广。那么同一故事为什么会被不同书籍反复征引改写呢?不妨从改动处探索诸书旨意。就这则故事而言,有以下较明显的变化:

变化之一,主人公身份的记载不同。《冥报拾遗》交代主人公系皇庭翊卫,其他书籍也提及主人公赴中台(尚书省)参选,这说明主人公身份为入仕者。可在故事流传中产生了主人公舍弃仕途而出家为僧的情节,《大唐内典录》、《三宝感通录》、《法华经传记》、《弘赞法华传》皆如此类,其宗教教化目的不言而喻。

变化之二,不同书籍常根据实际需要改动细节,这在佛教典籍中体现地更加明显。主人公所信奉的经书在不同书籍中记载不一,这种差异源于各书的实际需要不同,也反映出作者出于宗教目而加以变易经典。每一种书籍都有选择地指明了主人公奉持的经典:专记《金刚经》灵异之事的《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报应记》所记佛经是《金刚般若经》;《法华经传记》、《弘赞法华传》则是《法华经》。

传抄某一故事并不断加以改动,洵为唐代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唐代灵异题材故事得到不同撰写者的反复传抄、重新书写,故其叙事手法颇多雷同,所叙故事亦大同小类。灵异故事被诸书传抄的主要原因出于弘扬宗教的目的。宗教信仰成为推动灵异类故事产生和传播的主要动力,佛教经典信仰的传播潮流刺激《冥报记》、《报应记》、《金刚经鸠异》等小说集问世,而由经典信仰所孕育的大量灵异类故事又为这些小说集提供素材。《报应记》、《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等小说集频繁转引前人奉持《金刚经》灵异类故事,意在宣扬《金刚经》之神异,迎合了当时经典信仰的潮流。这种信仰潮流可从现存资料窥知,如《太平广记》保存120余则《金刚经》灵验故事,敦煌典籍含有大量《金刚经》类书籍,仅天津艺术博物馆就藏有33卷敦煌《金刚经》,约占总藏数10%。《金刚经》代表大乘空宗思想的发展,这部短小精典的经书逐渐成为唐人信奉的主要经典,赢得了无数士庶的青睐,被视为“续命经”屡屡出现于佛教宣验故事中,围绕此部经文而铺展的灵异故事不可胜数。因此,转抄他人灵异作品在当时极为常见。敦煌文

献中即有不少被反复征引的叙事作品,如《黄仕强传》、《荀居士写经灵验记》、《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等。

三、发挥想象自创作品

唐小说集中还有一部分作品既非记录坊间传闻,也不是改易别书而成,系出于作家自撰。此类著作以《玄怪录》、《纪闻》、《河东记》、《通幽记》、《传奇》等小说集为主,在其他小说集中亦不乏其例。由文士所编撰的作品极显文学底蕴,可读性较强。作者在小说中充分展示其才艺,构造了一个瑰丽奇异的想象空间。此类著作篇幅较长,文学色彩较浓,故事曲折离奇,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叙写生动,文采卓然,辞藻华丽。作者精心敷衍成篇,运用大量修饰手法,而这些特征在源自传闻、传抄他人的作品中则较为少见。传抄之作大多缺少文采,故事情节颇多雷同,语言过于平实;而由文人自创的故事则有效弥补了这一缺憾,堪称唐传奇之佳篇。

记录传闻、传抄他作、自创作品并非孤立相斥,唐代小说集常涵括三种不同的成书情况并形成相互补充的有机体系。小说家无论选用何种创作方式,皆具有一个鲜明特点,即以史家态度和笔法叙写故事。即使小说所叙故事虚幻不实,可“时人咸著传记彰明其事”^[4](p.265),依然以信实的态度撰写此类异事。唐人重视历史叙写方式,常用独特的历史关照方式记述故事,小说也或多或少受此思维的影响。作者采用类似史实的记载方式撰写故事,所记人物常附会于历史人物、事件,故其作品虚中有实,实中含虚。唐代小说集的三种成书类型虽然偏重不同的书写题材,记录传闻多记人物经历、传抄他作围绕灵异题材、自创作品喜好记叙爱情故事、历史事件,皆形成固定的风格、模式,然而它们合力扩展小说的书写范围,丰富了唐代小说叙事手法,完善了叙事技巧,进一步推动唐小说走向成熟。

【参 考 文 献】

- [1]唐临.冥报记[M].方诗铭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郎余令.冥报拾遗[M].方诗铭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 [3]张读宣室志[M].张永钦,侯志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段成式.酉阳杂俎[M].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 [5]钟辂.前定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7]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9]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 [10]神清撰,慧宝注.北山录[M].大藏经(第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1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 陈纪然]